目　　录

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 ……江文汉(1)

南社的创立与停顿 ……陈井林(43)

漫談商务印书館……章錫琛(61)

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 ……赵紫宸(106)

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概况 ……胡传揆(129)

我所知道的銘賢学校 ……吳克明(151)

回忆"重整道德运动" ……蔡文治(162)

晏阳初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平教会……赵　宪(172)

1920年北洋大学学潮回忆 ……刘介尘(186)

关于《1920年北洋大学学潮回忆》的几点补充 陶述曾(194)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程厚之(196)

国民党的反共特种教育 ……郑勇文(210)

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見聞 ……陈德芬(216)

国民党的书刊审查与上海新生事件 ……陈　畏(221)

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日报》 ……吳范寰(231)

质疑·补充·訂正

有关《两广"六一"事变》的补正……林仲荪(262)

对《四川綦江战干团惨案回忆》的补正……袁第欣(263)

对《中俄密約与李蓮英》的訂正……周传儒(265)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于选辑第十一、三十五辑几处的补正……刘翼飞(267)
对《唐继尧回滇讨伐顾品珍亲历记》的订正……吴厚安(369)
有关郭承恩事实的来函……郭慕孙等(270)
对《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
的补充……曾福谦(271)
对《我所知道的孔祥熙》的补充……孟　和(272)
对《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
的补充……曾福谦(275)
对《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
的补正……李汉冲(279)
关于汤恩伯在日本留学的情况……徐波人(280)
对《齐卢之战纪略》的订正……俞菜山(281)
对《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片断》的订
正……项文鉴(282)

附注

对《对〈中俄密约与李莲英〉的订正》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五十三辑二五八页

China

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

江　文　汉

广学会是基督教的一个历史较长、规模較大的出版机构。它也是英美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在"文字布道"的幌子下，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而具有一定社会政治影响的工具。解放后，已经有人发表过一些有关广学会的文章，我觉得我們在广学会工作的人有必要从内部来对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进行揭露。我自己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不到十年，现在根据一二十位跟广学会有过十年到三十年以上关系的职工們的共同回忆，結合会內保存尚称完整的英文年报，来对广学会的眞相提供一些資料。

一　广学会成立以前的基督教出版情况

基督教(新教)是从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馬礼逊 (Robert Morrison)开始传入中国的。初期的外国传教士都很注意文字宣传工作，当时最主要的是翻譯与刊印基督教的圣经。当时由于清政府对外采取閉关政策，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是很受限制的。首先，他們只能在广州的一个指定的区域进行貿易，而且不能和中国的老百姓发生直接交往。因此，馬礼逊等传教士只得在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馬六甲設立印刷所(1818年)，将印就的中文圣经以及一些闡述圣经的单张和小册子带到广州来分发，特别是在科举考試的場所分发。帝国主义分子夸耀太平天国洪秀全就是在这种場合

China

得到一本馬礼逊所刻的传道人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而信教的。鸦片战争以后，1842年的南京条約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从此帝国主义传教士就在这些"条約口岸"大肆活动。原来在馬六甲主持印刷所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于1843年在上海現今的山东路創办"墨海印书館"，主要是刊印中文圣经；1860年"美华书館"成立后不久，它的业务就停止。

"美华书館"最初是美国长老会于1844年設在澳門的，次年迁往宁波，1860年才迁来上海，位于北京路十八号。它的主要业务也是刊印圣经，但后来又接受广学会和其他教会团体的出版业务。1894年美华书館特别印制一本大号字、銀质封面的圣经，由美华书館負責人费启鴻(G. F. Fitch)的妻子和广学会負責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妻子代表所有在华的女传教士作为礼物送給那拉氏(慈禧太后)，庆賀她的六十寿辰。这件事当时在传教士当中相传为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商务印书館是1897年成立的，据传教士称，最初創办商务印书館的三位青年也都是从美华书館出来的，而且都是教徒。

在广学会成立以前，还出現了两类基督教的出版机构：一类是圣经会，共有以下三个組织：(1)大英圣书公会(1812)，(2)大美国圣经会(1822)，(3)苏格兰圣经会(1863)，都是以出版与发行圣经为业务的。这三个組织到抗战胜利后合并成为現在的"中华圣经会"。另一类是圣教书局，主要是出版一些宣传基督教的比較通俗的小册子和单张，分布在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廈門、沈阳、北京、九江、重庆等地，后来经过一番合并的过程，到解放前夕还有活动的只剩下汉口和廈門两处。

1877年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会議。在討論中，他們

China

很注意"基督教文字工作"。当时估計，从1810年到1875年传教士在中国編写了一千〇三十六种书刊，几乎全部属于圣经、圣詩、祷文、教义之类。由于传教士已经开始在中国各地創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对課本的需要很大，于是在这一次的会議上成立了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員会"，有名的文化侵略头子如林乐知（Young J. Allen)、丁韪良(W. A. P. Martin)、狄考文 (C. W. Mateer)、黎力基 (R. Lechler)、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傅兰雅(J. Fryer)等都包括在內，从此传教士就系統地編譯了一些从英美搬来的关于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化学、物理、植物学等課本，供教会学校使用。

二　广学会的成立

广学会的創办人是韦廉臣，苏格兰人，1855年由英国伦敦会派来中国，两年后因病又返回苏格兰。1863年作为"苏格兰圣经会"的代表，他再来中国，以烟台为据点，深入我国內地。在1877年那次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会議上，韦廉臣被选为"学校教科书委員会"的干事。后来，韦廉臣认为"学校教科书委員会"的工作范围太狭窄，乃于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創办"同文书会"，即現今的广学会，并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城組成"中国书报会"，以便在经济上对广学会起着所謂"母会"的作用。

如上所述，广学会原名"同文书会"，它最初的英文名称是"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照字面翻譯应該是："在中国人当中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譯作"广学会"是比較符合原文的，但究竟什么时候从"同文书会"改称"广学会"，現在很难断定；有根据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可查的，大概是从1892年起，即成立后五年，就已开始采用“广学会”这个中文名称了。1906年英文名称又改用“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中文名称则一直是“广学会”。

我們从这名称上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当时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意图。广学会成立于1887年，那一年是中法战爭結束后两年，对帝国主义一味妥协让步的洋务运动已开始破产，当时的先进人物已经看到专門倚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不能救亡图存，必须多多吸收“西学”的知识，实行政治上的变法維新，才能使旧中国走上資本主义的道路。可是当时中国人很少去过外国，懂得外文的人又非常之少，这就給在华的传教士提供了一个大可利用的机会。当时搞“西学”翻譯的只有1863年在北京設立的同文館和1867年在上海創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但这些地方都是由清政府聘請传教士負主要責任的，而且所譯的西书多属专門性质。韦廉臣发起成立广学会，就是要将英美資本主义社会較广义的所謂“西学”和“西法”更大規模地搬运进来。广学会的英文名称虽带有传教的幌子，而中文名称就根本沒有基督教三个字，企图以“推广西学”为号召，混进当时的維新变法运动，以便偷梁換柱，使中国淪为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广学会开始时規模很小，先后在上海西华德路（今长治路）二十五号、江西路四十一号与蓬路（今塘沽路）四十四号租賃房屋办公。1905年还在河南路四四五号設有发行所，門面上有“新譯书籍”和“时务要书”的招牌。1908年由上海英国商人汉 璧礼（Thomas Hanbury）出銀二万两（約三千英鎊）在北四川路一四三号（今多伦路口小菜場所在地）建成三层楼的办公房屋。1932年又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一二八号（兰心戏院旧址）盖了一所九层楼的大廈，連

China

地皮在内共花去关銀三十五万两，許多建筑材料和室内設备都是从国外运来的。房屋管理設有专門委員会，按香港英国殖民政府条例登記，后又改在上海英国領事館註册。創办时，广学会原有一套印刷設备，不久又售給設在汉口的苏格兰圣经会，此后一切书刊都是由会外印刷所代印，本身只搞編譯与发行业务。

三　李提摩太时代的广学会

广学会的創办人虽然是韦廉臣，但两年多以后，他就死去。1891年10月，四十六岁的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当时称为"督办"），連续几达二十五年之久。1916年5月他才退休回国，1919年4月20日死在伦敦。在李提摩太的经营之下，广学会有了很大的发展。当他进入广学会的时候，他是唯一以全部时間搞出版工作的传教士。在他以前，像林乐知、慕維廉（W. Muirhead）、艾約瑟（J. Edkins）等传教士都是以执行委員会成員的名义，以部分时間参加編譯工作。等到李提摩太退休回国时，广学会的正式干部已有传教士八人，部分参加工作的传教上也有五人。1908年起还有了自己的会所，产值从1891年的一千元增至1911年的225,579.84元，二十年中增加了二百倍。李提摩太在广学会开始活动的时期，正值我国变法維新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候，他所翻譯和写作的书册，有据可查的大小凡七十种，在当时"达官貴人"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无怪外国传教士說，李提摩太是广学会的"实际創办人"，許多年来"李提摩太就是广学会"。

李提摩太常以"三件大事"作为他在中国四十五年的"丰表功"。第一件是"办賑"。他是威尔斯人，1870年由英国浸礼会派来中国，开始在山东的烟台、青州一带传教。1876—1878年，山东、山

China

西等地逐年发生旱灾。1877年，李提摩太受英帝国主义当局的委派，携款六万英鎊去山西"办賑"，借此以"慈善家"的面貌出現，和好些大官僚如山东巡撫丁宝楨、山西巡撫曾国荃及继任的张之洞，以及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鴻章等人开始勾結。这个"办賑"的"功績"，当时英国政府蓝皮书曾予以贊揚。第二件是"办书报"。他充当广学会总干事二十五年，这就給了他充分的机会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以及政治方面的許多阴謀活动。第三件是"办大学"。当义和团运动被鎮压以后，李提摩太就提出利用"罰款"設立山西大学并由他控制十年的恶毒主张，这是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我国人民的血汗来搞文化侵略的"創举"。

李提摩太把他奴役中国的野心說成是"挽救"中国。他常說中国的人民群众是跟官員士紳走的，如果要控制中国的人民群众，就必須在思想上控制中国的官員士紳。当李提摩太于1891年就任广学会总干事的时候，长江中下游一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浪潮，他认为这是中国官員士紳所挑起来的排外运动。根据他的分析，官員士紳之所以排外，又是由于他們的"愚昧无知"，因而說什么他們不懂得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他們不懂得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好处，他們更不懂得传教士是中国人民的"眞朋友"。于是他就作出結論說，"无知是成見之母"，"易不知而进于知則救华之机全在此举"。

由于反洋教运动的蓬勃开展，李提摩太深信传教士有必要改变"传教"的方法。根据他自己在烟台、青州一带传教的经验，他认为在人民群众中传教，收效是不大的，他主张走"上层"路线，"改变了达官贵人，其余的就会像綿羊一样地跟着。"他特别提倡多搞出版工作，因为要使中国完全"門戶开放"，就必須使中国人民的头

China

脑，特别是“上等人”的头脑，开放起来。他深深知道西方对中国的炮舰政策已经产生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但他认为多从事“指导中国舆論”，就可以消除中国人民对“西方”的仇恨。1899年3月30日他給英国駐上海总領事白利兰(Byron Brenan)的信中，就談到这个問題。他說：“英国有必要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紙、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讀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宗教領袖，我們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

李提摩太对于从思想上奴化中国人民的企图是很狂妄的。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話是“以百万計地进行感化”（“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就因为这个主张，他被帝国主义看中，指派他来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后来他出版过一部英文书，也是以这句話为书名的。我們知道帝国主义传教士所說的“感化”，实际上是“奴化”、“毒化”和“殖民地化”中国人民。李提摩太說：传教通常采用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是設教堂讲道。他认为这个方法花时間太长，因为传教士能同信徒接触的数目究竟有限。当时在华传教士担任布道工作的总共只有一千人左右，他們如何能单靠讲道去影响当时的四亿中国人民呢？第二是办学校。李提摩太认为这个方法也太慢，传教士不可能在这块比欧洲还大的土地上到处設立学校，而且学生需要经过好几年的培养才能在社会上起一些作用。第三是开医院。李提摩太认为通过医院所能接触的都是病人，而病人又是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因此收效也不很大。第四是搞文字出版。李提摩太认为这是“以百万計地进行感化”最有效的方法。他說：‘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則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

李提摩太对于如何尽快地从思想上和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是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算过一笔細賬的。他說当时中国的人口有四亿，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的头一百年所收的教徒不到二十五万人，平均每个传教士只有教徒五十人，而当时中国人口每年增加达四百万，教徒每年增加不到两万，他认为单凭办学校、开医院、設教堂是无法使信徒增加的速度赶上人口增加的。因此，他提出了一个迅速"感化"全中国的狂妄計划。

广学会当时出版的书刊几乎全部是分送出去的，李提摩太认为要着重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有計划地委托各地传教士亲赴考場分发书刊。按当时的科举考試制度是三年一科，府取秀才，省中举人，京师中进士。全国各省共有二百个考場，約計一百万以上的考生。李提摩太认为通过书刊去"系統地指导"这些未来官員的思想，就等于"指导"了中国四亿人民的思想。他肯定地說："要感化中国，就沒有比文字宣传来得更快的方法了。"

第二，是抓住一批经常施加影响的对象，在这方面李提摩太作过以下具体的估計：

文官自县长以上者	2,289人
武官自营官以上者	1,987人
学官自府視学以上者	1,760人
大学堂教习	2,000人
派駐各省省会的高級候补官員	2,000人
科举出身的文人(就其中百分之五計算)	
（1）在北京考取进士的	
（2）在二十行省考取举人的	
（3）在二百五十三个府考中秀才的	
以上三种人士合計約計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姑以六十万人計算	30,000人
经过挑选的官家及书家的妇女儿童(就其中百分之十計算)	4,000人
共計	44,036人

China

李提摩太认为这四万四千多人是"迅速成功"的起碼对象。当他就任广学会总干事提出这个計划时，他說："我們建議把这些人看作是我們的学生，对他們进行系統的教育。"他深信控制了这些人就等于控制了全中国。

四　林乐知与《万国公报》

最初創办广学会的时候，除了韦廉臣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美国监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林乐知于1860年被派来中国的时候才二十四岁，1907年死去，在华凡四十七年。他来中国不久，美国国内就发生了南北战爭，经济来源中断，他乃应上海江海关监督之聘，担任广方言館的讲席，后来又为江南制造局譯书，达十七年之久。他在广方言館曾获得"欽賜五品衔"，后来又得"欽加四品衔"。1868年他独自出版一种周刊，名为《中国教会新报》，封面上有"万事知为先"五个大字，发行只几百份。1875年改名为《万国公报》(《Chinese Globe Magazine》)，附一行小字說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可見內容范围已经扩大，着重政治宣传，而教会新聞已不很重要了。经常撰稿的除他自己以外，还有韦廉臣、李提摩太、慕維廉、丁韙良、狄考文、艾約瑟、李佳白(Gilbert Reid)、潘慎文 (A. P. Parker)、花之安(E. Faber) 等传教士，发行量增至一千册以上。1881年美国差会恢复了对他的供給，他又回到教会工作，首先忙于在上海虹口創办"中西书院"，《万国公报》遂于1883年7月停刊(已出七百五十期，滿十五年)。1887年广学会成立，1889年又在广学会的支持下再度复刊，并从周刊改为月刊，英文名称亦改为《A Review of the Times》，一直发行到1907年他

China

死后不久，才完全停刊，共出二百二十二期，最多时发行达四千份。

«万国公报»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初出版的时候，中国的报刊还不很盛行，全国各地只有五、六种刊物，而且限于香港和几个通商口岸；上海也只有西文报，而无华文报（申报1872年才开始，新聞报1892年发行）。由于中国人当时很少懂得外文，所以当传教士把西方的"新知识"和新聞譯述过来，就感到很新鮮。在中日甲午战爭的时候(1894—1895)，«万国公报» 陆续发表了有关中日战爭的消息、言論和文件，包括李鴻章所提供的軍中密电，銷数陡然上增，从每月一千份增到四千份之多。这些資料又由广学会陆续彙編成书，名为«中东战紀本末»，共分三編，初編八册，于1896年4月出版，续編四册，于1897年2月出版，三編四册，于1900年2月出版；全集共十六册，重印多次，至1916年始告絕版，銷数达万部以上。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蔡元培序的«东西学书录»，都把这部书介紹为应讀之书，但这部书完全是替日本的軍事侵略张目，称它为"义战"，并宣传清政府应負战爭主要責任，还大談中国必敗的原因。

1895年8月17日，維新派人士在北京用木刻活字印刷出版一种刊物，也名«万国公报»，隔日发行一册，其形式与«京报»(即«宮門鈔»)相似，每册只有論說一篇，不少是轉載广学会的报刊文字，每期印一、二千份，随同«京报»附送王公大臣。李提摩太說，由于他的建議，后来才把名称改为«中外紀聞»(又名«中外公报»)，但是年冬就被清政府封禁。广学会尚保存有这北京出版的«万国公报»(从第一号至第四十五号，凡三个月)一份，可算是稀有的資料。

林乐知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推行文化侵略的急先鋒。他来中国不久，就认为以下几項"必与教会相輔而行，而后传道之成效可

China

观”：第一，“設立教会大学堂，先立中小学堂以为之基”；第二，“譯书撰报，以广教益而牖文明”；第三，“創立印书局，以助书报之广传”。他的“献策”得到美国差会的赞揚与批准。除了創办与主編«万国公报»以外，他在上海創办了中西书院，还协助設立了中西女塾和苏州的东吳大学。当广学会成立时，他积极参加；头二十年，他是写书最多的一个，有据可查的大小书册凡四十四种，比較有名的大本头书除«中东战紀本末»外，还有1905年出版的«五洲女俗通考»，广学会曾将此书用黃色貢緞裝訂送給中日两国皇后。

过去在广学会的小礼堂里经常挂着韦廉臣、林乐知和李提摩太的放大照片。这三个人都是創办广学会的重要人物。他們在企图从精神上和思想上奴化中国人民方面也确实是志同道合的。1912 年广学会召开年会的时候，美国长老会駐华代表路崇德(J. W. Lowrie)曾把韦廉臣和林乐知比作清朝的乾隆和光緒，至于李提摩太，他还覚得很难找到可以比拟的中国皇帝。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都自称是“以至誠爱中国”，“中国之老友”，像林乐知所說，“余来华四十年，自問无异于华人”。他們都学会讲中国話，看中国书，有时也穿清朝礼服，帽戴假辮，还取有中国名字(林乐知别号荣章，李提摩太别号善若)，把他們从美国获得的“博士”台銜說成是“美国进士”。他們善于用这些外衣来騙取中国人民的好感。然而，在他們的眼中，中国人只是“半开化”的民族。他們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三类：白种人属于有文化的一类，中国人和印度人属于半开化的一类，而非洲的黑人則属于根本沒有文化的一类；他們认为白种人对半开化的和未开化的有色人种具有“白人的負担”(“White man's burden”)，那就是要把所有有色人种置于英美列强的“保护”之下，而传教士的任务就是担任“教导”和“开化”。他們对中国

China

的所謂“爱心”和“友誼”的实质，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　广学会与维新运动的关系究竟怎样

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曾吹嘘說，中国1895—1898年的維新运动是在广学会书刊的影响之下而产生的。他們经常所宣传的特别着重有下列几項：

（1）1895年10月17日李提摩太第一次在北京与康有为会面，认为康有为的«上皇帝书»內容与广学会的主张完全吻合。李提摩太在北京需要一位中文书記，二十八岁的梁启超就“自願充任”。那年7月維新派人士在北京組织“强学会”，李提摩太和那些人经常往来，商議維新。

（2）光緒皇帝立意变法維新，曾经采购书籍一百二十九种，其中八十九种都是广学会出版的。八国联軍占領北京时，有传教士在皇宫里看到光緒所存放的全套«万国公报»。

（3）1898年2月維新派人士編有«皇朝经世文新編»（传教士称为“蓝皮书”），共收集論文五百八十篇，作者二百九十五人，最多的是梁启超，共四十四篇；其次是康有为，共三十八篇；再其次就是李提摩太，凡三十一篇，林乐知也有五篇。

以上似乎說明广学会和維新派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是完全支持維新运动的，但我們应該指出，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倡导的維新运动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所提倡的“西学”、“西法”，完全是两条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抱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目的。維新派人士主张“变法”，而变法的目的在于消除外患，救亡图存。康有为說：“能变則全，不变則亡，全变則强，小变仍亡”；广学会的传教士則反对所謂“过激的傾向”，他們的目的是在提倡“西学”、“西法”的幌子

China

下，灌輸殖民地思想，企图把中国变为英美的殖民地。

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认为中国的問題在于人民的“愚昧与落后”，一切都是咎由自取。李提摩太譯过一部馬恳西著的«泰西新史攬要»，据說1895年出版后成为当时“最风行的讀物”，1920年的广学会图书目录还将此书列入。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胡說：“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借兵力以定商情”，可见“中国不願与他国交往……閉关开衅之端則在中国”。然后他分析中国一蹶不振的原因說：“深知中国近年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实有取敗之理。”林乐知在«治安新策»中分析中国在中日甲午战爭中失敗的原因，称中国人有驕傲、愚蠢、恇怯、欺誑、暴虐、貪私、因循、游惰等八种积习，“朝鮮之役，非日本之能敗中国也，中国自敗之也。”这种倒因为果、顛倒黑白的說法，正是西方資产阶級历史家一貫对中国近代史的歪曲和誣蔑。

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最終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第二个殖民地印度。他們经常頌揚当时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李提摩太說：“自英为政于印度，去其太甚，教所未经，不数年而俗为之一变，国为之一新。”（見«时事新論»第八卷第十一頁）林乐知还特别写过一篇«印度隶英十二益說»，胡謅印度人民在英帝国主义統治之下，享有十二种“太平之福”。林乐知于1897年起草的一个«中国新教育制度的規則»，也主要是根据英国統治印度所訂的制度。广学会出版有关介紹殖民地印度的书籍总在十种以上，如«大英国治理印度新政考»、«印度史攬要»、«印度政治家事略»、«印度筹税纲要»、«印度刑律序»等等。

广学会的帝国主义分子对于“改革”中国的具体办法就是一条，即促使清政府聘請英美人士充当最高顧問。这是李提摩太阴謀

China

控制中国的一贯主张，有据可查的，列举如下：

（1）1894年3月1日，李提摩太提出“如何增加对中国的貿易”的方案。他主张設立一个“新教育”的部門，目的在于通过办理新教育来开发中国的丰富資源；他还主张将这个部門置于总理衙門与海关总稅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的直接管轄之下。

（2）1895年2月5日，中日甲午战爭快要結束时，李提摩太去南京会見两江总督张之洞，提出“京师閣、部、府、院、寺、监及外省督、撫、提、鎮各衙門，各宜聘一声望素著之西人，奉为蓮幕上宾，遇有重大事件，必就商之”。

（3）1895年10月，維新运动正在开展，李提摩太向光緒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提出所謂“新政策”，他在“中国目下应办之事”中特别提出要清政府“延聘深可信任之二西人，合筹良法”，并設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英美人”。李提摩太心目中的四位英美人，就是指海关总稅务司英国人赫德，英国汇丰銀行大班艾迪斯(Charles Addis)，曾任美国国务卿、李鴻章的顾問科士达(W. J.Foster) 和天津海关稅务司美国人杜德維 (Commissioner E.B. Drew)。

（4）1899年8月26日，李提摩太又提出“中国問題的解决办法”。鉴于列强对瓜分中国存在着矛盾，他主张由英、俄、法、德、美、日各派一人为清朝廷的顾問，会同六名中国官員，在那拉氏与光緒之下，享有最高权力，掌管国家一切事务。

（5）1900年7月14日，正值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館，李提摩太提出“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方案。鉴于中国已经“沒有一个遵行条約的中央政府，而且两年来暗地里把中国陷入于赶走一切洋人的战爭之中”，他主张列强組织一个由一半外国人、一半中国人参加

China

的"联合中央內閣"。凡提供一万人以上軍队的外国可各派二人参加，中国各省督撫可以提名相等的人数。

（6）1910年9月8日，辛亥革命前一年，李提摩太又写了一篇«用最快的方法感化中国»，主张清政府立即在各个最高部門聘請八位或十位世界上最好的专家作为顾問。

（7）1910年9月19日，李提摩太在伦敦拟出"在一个最紧急的时期的一个最好的挽救办法"，要求清政府聘請十位具有世界名望的人士来充当中央十个部門的顾問。

李提摩太要使中国淪为殖民地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然而維新派人士对于帝国主义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們对于传教士的阴謀詭計更是缺乏警惕。他們迫切要求学习西方，而传教士是当时传播"西学"与"西法"的主要媒介。传教士在形式上所提倡的办报紙、立学堂、譯西书等等，又符合維新派人士的要求。因此他們把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当作"好人"。他們曾推荐李提摩太为光緒的顾問大臣，原定1898年9月23日引見，而9月21日就发生了政变，因而这次顾問沒有做成，后来李提摩太一直引为遺恨。但他在写信回国或給外国友人时，仍以自封清政府"候选顾問"的台銜标榜自己。广学会尚保存有康有为致李提摩太的亲笔信，內中康有为恭維李提摩太"以救人为事"，"于中国事一片热心"，并望李提摩太在結束义和团运动的"和議"中"主持公論"。由此也可以看出維新派人士对帝国主义传教士的侵略本质是缺乏认识的。

广学会自称是維新运动"最好的朋友"，但是当維新运动失敗以后，李提摩太評論"改革未能成功，因为一般人失于激烈，过于急进。氏常劝誡改革的运动須用和緩方法开导守旧派，并启迪皇太后，而后可以成功的。"（苏特尔：«李提摩太传»第七十二、七十三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